

太平天国史丛书
广西人民出版社

梁义群 著

太平天国政權建設

太平天国政權建設

梁義群 著

(桂)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欧薇薇

责任校对 蔡素琴

太平天国政权建设

梁义群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1.625 印张 266 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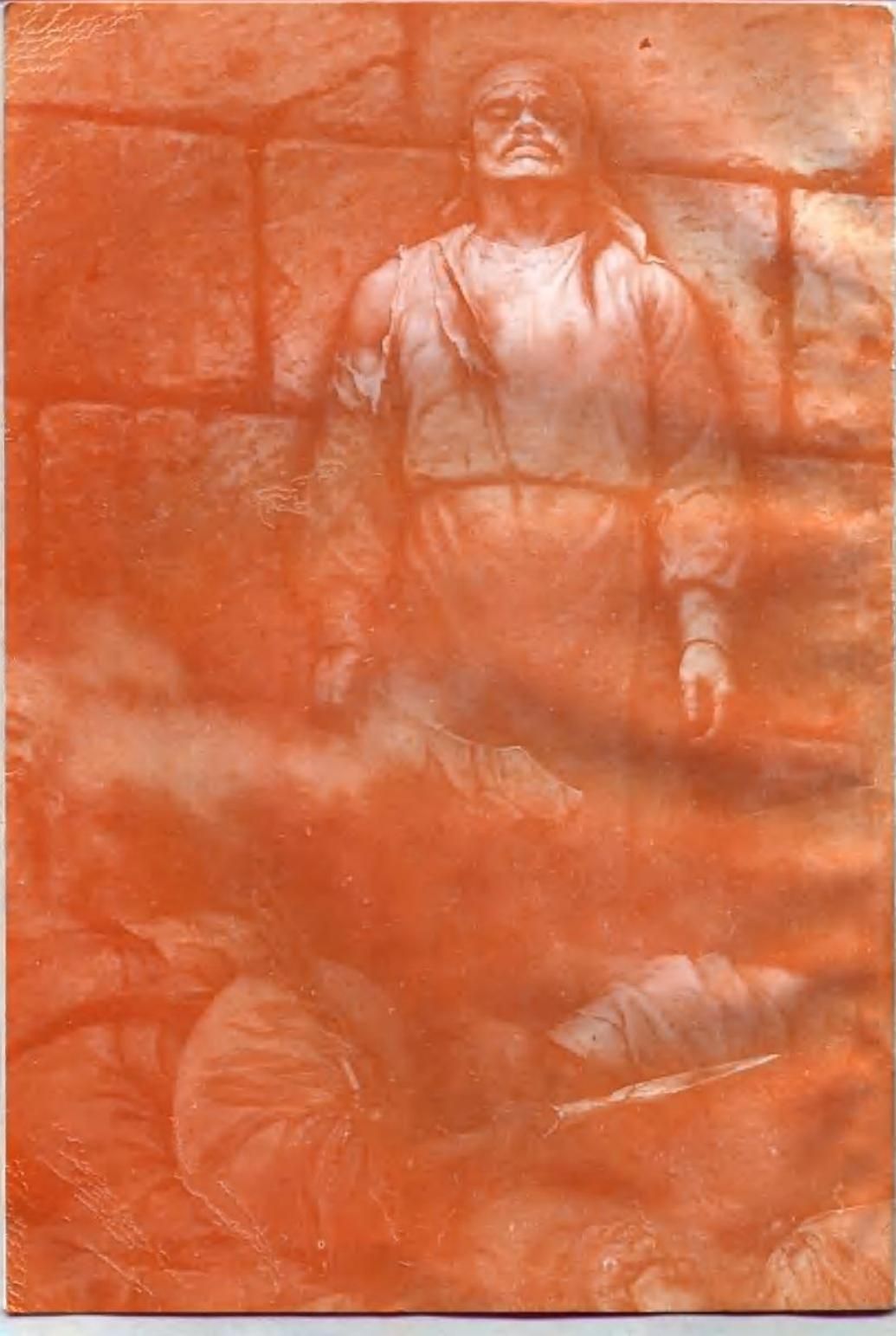
1995 年 7 月 第 1 版

1995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ISBN 7-219-02977-2/K·406 定价:12.80 元(平装)

定价:16.00 元(精装)





《太平天国史丛书》编委

顾问 罗尔纲

主编 钟文典

副主编 吕 梁

编 委 (按姓氏笔画)

吕 梁 刘君达 朱哲芳

陈仁华 张 脩 欧薇薇

钟文典 饶任坤 彭大雍



梁义群 河南省鄢陵县人。1932年生，1954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至今。著有《近代中国与近代财政》，主编《百年国耻》等，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论文近60篇。现为教授。

03

96
K254.2
3
2

序

十九世纪中期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是近代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深远，深为世人所关注。

这些革命，虽然仍旧是一场农民战争，但它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肩负了中华民族反封反帝的历史大任。它的思想、制度和斗争实践都具有自己的和时代的鲜明特点。

百余年来，中外人士关于太平天国历史的记载与论述甚多，褒贬也不一致。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的历史地位与功绩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

为了拓展和加深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弘扬中国人民革命爱国主义精神，为人们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我们决定编纂《太平天国史丛书》。这个想法，得到中外学者和广西人民出版社的热情鼓励与支持。我们深信，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与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实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深入的再探索，力求这套丛书编得全一点，新一点，深一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全国的专家、学者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我们谨以诚挚的心情感谢各方的鼓励与支持，并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太平天国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C

329931

序 言

钟文典

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长期以来，太平天国史学界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也存在着不少意见分歧。有的论者认为，太平天国虽为农民战争，而“农民政权”说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是不相符合的。有的论者则根据列宁关于历史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劳动者政权”的论断，认定太平天国政权的存在。但是，对于太平天国的国体，是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或是农民阶级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它的政体实行的是军师负责制，或是天王自专制，又有不同意见。论及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更有“封建政权”，“农民政权”，“封建的农民政权”以及革命性与封建性并存的“两重性政权”等等说法。由此可见，对于太平天国政权问题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

由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曾经建立过自己的政权，这是历史事实。因为这次革命发生在近代，它的政权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农民政权相比，更为完整和成熟，也更具典型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曾经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猿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对太平天国政权的研究，不但有助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深入，而且可以帮助和推动对古代农民政权以及同时期的诸如天地会政权和少数民族反清政权

的研究，并有利于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整个农民政权，从中得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如前所述，多年以来，我们对太平天国政权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无庸讳言，从这个政权的产生、发展和覆亡的全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则相对的显得薄弱，因而也就影响了我们对它获得全面的认识。这是美中不足的。

梁义群同志在多年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太平天国的历史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考辨，写成了《太平天国政权建设》一书。在这部20多万字的专著中，作者紧紧围绕太平天国政权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诸如：拜上帝会是否存在；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的形成；太平天国的国体和政体，它的中央、省、郡、县和乡官政权组建的特点、作用及其赖以存在的条件；军师制和主将制的形式、演变及其在太平天国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太平天国后期的分地制等等，都作了专门的论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展示了太平天国政权建设的全貌。通过对太平天国政权建设的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细致的考察，作者还就有关太平天国政权的一些理论问题，从宏观上作了阐述，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有利于对问题的深入探讨。

我和义群同志是缘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而认识的。而且都在从事高等师范教育工作，可谓“同道”。拜读了他的书稿，深感文如其人——实在而深厚。在他的大著即将付梓之际，他再三叮嘱我写几句话。我感谢他把这部专著作为“太平天国史丛书”的一种。它的问世，为“丛书”增辉，为太平天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成果。我更感到由衷的高兴。

1995年1月5日
于桂林王城

目 录

序 言	钟文典
第一章 政权在拜上帝会中孕育	(1)
第一节 拜上帝会宗教组织的存在	(1)
第二节 “桃园结义”与“三位一体”	(7)
第三节 君权神授的“符瑞”——《太平天日》	(17)
第四节 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的最后形成	(25)
第五节 军师制的确立与“天王登极”	(36)
第二章 广西战地草创政权	(46)
第一节 起义·建国·建军	(46)
第二节 军师主将制的确立	(59)
第三节 封王与建政	(66)
第四节 《太平天历》与《太平礼制》	(79)
第三章 大放异彩的天京政权	(85)
第一节 天京政权的特点	(85)
第二节 代行中央权力的东王府	(101)
第三节 职官等级问题上的分歧	(109)
第四节 官吏铨选与考试、招贤制度	(115)
第四章 别开生面的地方政权	(128)
第一节 省级政权	(129)
第二节 郡县政权	(132)
第三节 乡官政权	(133)

第五章 国体·政体·支柱	(161)
第一节 国体与政体	(161)
第二节 “政权就是武装”	(168)
第三节 “政教皆本天法”	(171)
第四节 赋税——政权存在的经济保证	(191)
第六章 “政局骤变”与大纲紊乱	(212)
第一节 王权与“相”权矛盾的解决	(212)
第二节 军师制的名存实亡和君主专制的加强	(217)
第三节 广授官爵与滥封众王	(233)
第四节 山头林立,割据之势渐成	(244)
第七章 农民政权的蜕变与覆没	(258)
第一节 农民政权蜕变的必然性	(258)
第二节 腐败是葬送农民政权的鸩酒	(266)
第三节 政策向地主阶级倾斜	(286)
第四节 苏浙地方政权的变色及其瓦解	(297)
第五节 天京政权的覆没	(323)
第八章 历史贡献与深刻教训	(332)
第一节 历史的贡献	(332)
第二节 深刻的教训	(346)

第一章 政权在拜上帝会中孕育

第一节 拜上帝会宗教组织的存在

太平天国农民领袖洪秀全，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穷苦知识分子，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饱读经书、奔波科场中度过的。从道光七年(1827年)起，洪秀全曾多次赶考，却连个秀才也未能考中。个人仕途的坎坷，与国家、民族的灾难交结一起，激发了他的反抗思想和改造社会的愿望。但是他把理想真正变为行动，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应考再次受挫，偶尔阅读了10年前(据有人考证在1833年)得到的《劝世良言》，深受启发，决心皈依上帝，与冯云山、洪仁玕、李敬芳创立拜上帝教以后的事。洪秀全毅然毁掉了孔子牌位，失去塾师职业，决定“出游天下”，走向广阔的社会，大力宣传“真道”。1844年4月，洪秀全与挚友冯云山等先在广东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等十数府县传教，应者寥寥；又辗转来到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下文同)赐谷村传教，仍收效甚微。但他并未因此而气馁，认真吸取教训，决意返回花县，从事新宗教理论上的创造，以祈再展宏图，力争实现美好理想。但是，人各有志。冯云山却坚持革命实践斗争，留在广西继续宣传“真道”。他抱着“谋国”大志，不畏艰险，只身来到紫荆山区，先打短工，后作塾师，以塾师为掩护，在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开展宣教传道组织活动。历经两年，出人意外地做出了很大成绩。对此，《太平天国起义记》作了这样述

说：“云山在紫荆山地区数年，以巨大的热诚传教，获得成功，有很多人，甚至全姓全族的人，受了洗礼。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些宗教团体，聚集在一起进行宗教礼拜，很快就以‘拜上帝会’之名闻名于远近。”^①这一段话，透露出鲜为人知的情况。冯云山的成功表现在：一是打破了他与洪秀全起初在广东以及在广西贵县传教的沉寂冷落的局面，在一个“地僻而险”的紫荆山山区，居然发展“拜上帝之教徒未久即有逾二千之多，其数且日增”。^②二是在教徒越来越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宗教组织实体——拜上帝会。

不过，目前学术界对洪秀全、冯云山是否建立“拜上帝会”组织，存在较大歧异。争论的问题之一，是上述韩山文的记录材料提到的“拜上帝会”是“自称”或是“他称”。的确，仅就这段话（包括英文原文），是无法确切判定“拜上帝会”是“自称”还是“他称”，还必须借助别的材料才能判定。然而，在搜求别的材料时，人们又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在太平天国官书和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人的记载中，却没有发现“拜上帝会”这个名称，相反，“拜上帝会”这个名称却在清方记载中屡屡出现。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即究竟是太平天国文献记载可信呢，抑或是清方记载可信？纵观上述争论，我们认为所谓“拜上帝会”是“自称”或者“他称”，恰恰说明“拜上帝会”的存在，而不能证明“拜上帝会”的不存在。不能因为不是“自称”就否定“他称”的存在，因为不论“自称”或“他称”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否则所谓“自称”或“他称”的争论就毫无意义了。同样，不能因为太平天国文献不见“拜上帝会”的名称记载，而清方记载中屡屡出现“拜上帝会”名称，由于清方是敌方，就可以轻易判定清方记载一概不可信。也不能因为太平天国文献没有记载，而简单作为否定“拜上帝会”不存在的根据，归根还是要看“拜上帝会”的存在到底是不是事实。

^{①②} 《太平天国》（六）第853、857页。

要解决这个问题，弄清事实固然是第一位的，而在思想方法上也有改变的必要。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深入考察“拜上帝会”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它具有的特点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长期以来，人们对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李敬芳在 1843 年创立的是“拜上帝教”，抑或是“拜上帝会”，可说是模糊不清的。但也有少数学者一开始就断定洪秀全等 1843 年创立的是拜上帝教，根本没有创立过“拜上帝会”，直到金田起义都是一伙“拜上帝的人”发动的。与这一观点紧密相连，他们又提出“拜上帝会”这个名称“是一些地主、官僚的奏报和记载”提出的，太平天国文献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断定“后者应该更可信一些”。^① 这种认识，事实上在史料的运用上或者在逻辑推理上都有斟酌的必要，所以无法令人信服，这就是引起上述争论的缘由。

的确，在 1843 年洪秀全等人决心皈依上帝，创立的是拜上帝教而不是拜上帝会，这是历史事实。这是因为在当时还不具有建立拜上帝会的条件：首先是洪秀全等人当时仅从《劝世良言》中，初步领悟到“上帝”独一真神的无上权威，和获得上天堂之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从而萌发出以教传道，改造世道人心，斩邪留正，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人民。这无论是从出发点和实践活动上看，都未超出宗教活动范围。尽管洪秀全内心埋藏着对现实黑暗社会不满和反抗思想，甚至冯云山一开始就有“谋国”大志，但这些思想还只停留在他们潜意识之中，因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主张。事实上，在客观上也不具有实现其深层思想的条件。何况，他们起初的宣教活动并不成功。虽然跋涉山川，千辛万苦，历经艰难，在广东清远受洗者才五六十人，而在广西贵县受洗者也仅逾百人。正是这种不景气的现实，才促使洪秀全决心返回花县，希图经过从事新

^① 《太平天国兴亡史》第 18 页。

宗教理论上的一番创造，开辟一个新局面。所以，在这个时期不仅洪秀全等没有建立拜上帝会的思想，而且事实上也不具有建立拜上帝会的客观条件。因此，一开始只能从事拜上帝教的宗教活动，而不可能建立起拜上帝会这样一个宗教组织团体。

然而，连洪秀全也没有想到，他的理想，却由留在广西的、热衷于革命实践活动的冯云山来实现了。我们从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教活动中可以看出，一开始就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公开遥奉“洪先生”为教主，向群众宣传拜上帝；但暗地里扎根串连、访贫问苦，特别关心贫苦农民的现世利益，保证大家拜上帝后“有吃有穿”、“无灾无难”，以至将他向贫苦农民所许的这个愿，注入拜上帝教的仪式之中。那么，冯云山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把他对贫苦农民所许的这个愿加以兑现呢？固然可以借助“上帝”的神威给予贫苦人民以精神寄托，但是空洞的宣传，终归是无法使最讲究实际的贫苦农民信服的。既然冯云山所许的愿不能立即兑现，那么他至少要给人们指明通向天堂，永享天福之路。联系到当时历史实际，唯一的道路，就是组织起来，铤而走险，推翻清王朝，这也就是冯云山所谓的“谋国”的大志。当然，冯云山当时是不可能用这样明确而激烈的言词告诉群众的，恐怕如此宣传贫苦群众也未必能够接受。冯云山只能用宗教的语言，但又包含着政治的内容，将他的本来意图巧妙地灌输给群众，否则群众就会永远停留在不觉悟的状态之中。事实上无论是洪秀全或者是冯云山都不是职业宗教家，他们宣教的实践活动，都不可避免要带有政治色彩。只是这种政治色彩是不露声色的，无法使外人察觉罢了。可以说，这就是洪秀全、冯云山能获成功的一个奥秘。

从冯云山早期的革命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最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位革命家，这从他在 1847 年被捕后为自己所作的辩护词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来地主王作新强加给他的“罪行”是：“迷惑乡民，结盟聚会”；“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但

是，冯云山针锋相对，给予严厉驳斥，说他是“遵旨敬天，不犯不法”，“一切上帝当拜，古今大典，观广东礼拜堂悬挂两广大宪奏章，并皇上准行御批移文可查”^①。这个驳斥是强有力的。因为他将当今“皇上”的“御批”搬出来做自己的护符，于是把他的活动一概说成是“遵旨”而行。这样他一开始就站到置地主王作新于死地的制高点，弄得地方官吏哑口无言，不知所措，最后只好将其无罪释放。这可说，是洪秀全、冯云山能获成功的第二个奥秘。从这个意义上，洪秀全、冯云山可以说是近代一切维新家、革命家进行合法斗争的鼻祖。从当时地方官吏始终未发现他的“造反”证据来看，他的革命活动是十分严谨的，其策略手段是相当高明的。

冯云山被捕而获无罪释放，这是整个“拜上帝之人”的胜利。这个胜利初步显示出“拜上帝之人”是很有力量的。其力量显然是来之“拜上帝之人”严密的组织性，而不仅仅是其宗教信仰维系之故。这样，自然就会使人联想到有关“拜上帝会”存在的记载。冯云山在紫荆山区从事宣传拜上帝有两年的时间，既然拜上帝之人与日俱增，再联想到他们远大的斗争目标以及现实斗争复杂情况，这说明在当时建立一个宗教团体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个宗教团体从一开始就是秘密的。其公开进行的是宣传拜上帝，暗地里也许正如王作新说的，是“结盟聚会”，即组成一个宗教组织的实体——拜上帝会，作为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本来采取“秘密结社”或“会党”形式进行反封建斗争，就是农民进行斗争的传统形式，实际上也是近代各阶级、阶层进行反清斗争所普遍采取的形式。

那么，太平天国有什么理由要抛弃这个行之有效的斗争形式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借助外来的宗教所致吗？事实上，外来宗教不仅不排斥这种形式，恰恰同样也借用这种形式。我们知道，西方国

^①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三)第83页。